

第一章 泰州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明代中后期，即 16 世纪前后，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发展过程已经开始走向衰落，进入了晚期。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已经出现手工业、城市商业和对外贸易，以及私人对土地的经营。就是说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幼芽。随着资本主义幼芽的出现，阶级关系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同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对人民群众压迫剥削的加重，市民的斗争，手工业工人的斗争，以及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也逐步展开。中国的封建社会出现了严重危机，已经到了“天崩地陷”的时刻。

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幼芽已经出现

16 世纪的中国，从全国来看，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在农业生产方面，生产工具有所改进，效率不断提高。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能因地制宜，用人为的力量去改变自然条件，使“田无不可耕者”。如江南昆山归姓地主，不仅通过兴修水利，开垦和改良土壤，提高农作物产量，而且加强经营管理，“其治数千亩如数十亩，役属百人如数人。”^①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科学技术著作，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以及《沈氏农书》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对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我国农业在生产技术和经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江南水稻一般亩产二三石，有的多达五六石。有的地主税收以“亩入十石为上功，七石为中功，五石为下功”。^①可见，当时农业生产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手工业方面，不但有较大的发展，而且生产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明中叶冶铁业发展很快，全国产铁地区增加到一百多处。河北遵化、山西阳城、广东佛山、福建龙溪等地，出现了较大的冶铁、铸铁和锻钢业。各地冶铁业所生产的铁器，除行销内地外，还出口到海外。明代的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广东、福建、江南的造船厂拥有世界的头等技术，所造的大型海船，不仅供应国内，而且出口国外。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江南船厂所建造，设备齐全，火器精良，仅船锚就重达千斤，船队可载数千人。郑和的庞大船队，可以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东岸，充分反映了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高度发展水平。明代的陶瓷业也有高度发展，中叶以后，景德镇的民窑发展很快，窑身很大，每次可烧一千余件，民窑制品精良，驰名中外。明中叶以后，纺织业的生产水平提高更快，纺织机械和纺织技术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苏州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售的织机，就有綾、绢、纱、罗、绸、布等各类品种。织出的产品巧变百出，花色日新。可以织出不同纹路、不同花样的綾罗绸缎^②。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由于社会地域分工日渐明显，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商业更加繁荣，一些工商业中心的城镇也随之发展起来。当时工商业发展比较显著的城镇，大体上分布在江南（今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和安徽、江西的一部分）、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这几个地区。而其中发展繁荣的江南地区，

霍稻：《霍渭崖家训旧图第一》

② 崇祯：《吴县志》

又主要集中在苏、松、杭、嘉、湖五府，东南沿海的泉州、漳州、福州、广州等城市，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工商业也有明显发展。这些口岸，“番舶不绝于海澨，蛮人杂遯于州城”，^①当时政治中心的南、北二京商业也很繁荣。南京居民“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居”。^②万历时，南京人口大增，原来“金陵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蕃，居民日甚，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③至于北京，更是“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今辇毂之下，四方之人，咸鳞集焉”^④。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除南北商贩往来运输外，嘉靖时曾明令漕船军夫，每船可携带货物二十石，沿途自由贸易，促成运河沿岸的扬州、淮安、临清以及徐州、济宁、济南和通州等地更趋繁荣。在东南沿海的泉州、漳州、福州、广州等城市，不仅商业比较发达，而且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反过来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由于商品生产的扩大，商品数量的增多，商业资本也非常活跃，经商人数量也比过去为多，出现了不少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形成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闽商、吴越商等等。徽州商帮形成于明朝成化、弘治年间，他们的足迹遍于全国，活动于全国各省都会及大小城镇，有“无徽不城镇”之说。山西商帮在明朝中期也已形成。活动范围初以黄河流域为主，后来扩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号称“足迹遍天下”。在明代中叶，“富商大贾之类，如病如狂，走县供奉者，不知其数”。^⑤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有些地主、官僚也兼营商业，有些商人也经营土地，形成商人、地主、官僚三结合。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明王朝不得不实行一些客观上有

① 《工部厂库须知》卷四

顾起元：《客庭赘语》

正德《江宁县志》卷3《铺行》

张翰：《松窗梦语》卷四《百工记》

⑤ 《明神宗实录》

利于商品生产发展的经济改革措施。具有代表性的是万历时期张居正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这是将封建劳役赋税货币化的重大改革，对于促使自然经济的分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张居正的改革，固然是为了缓解明王朝的危机，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是与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商人资本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分工的扩大，出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向。在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手工业已逐渐脱离农业而开始独立，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纺织业日益发展起来，并在一些地区以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出现。“以机为田，以梭为耒”，^②靠编织为生的机户日渐增多，有的已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工场手工业作坊，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这种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手工业者，在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和江西的大三角地带，特别是在苏、松、杭、嘉、湖地区越来越多。有些城镇的手工业者已从广大的小商品生产者中分化出来，逐步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作坊主。甚至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由包卖商去支配广泛的小商品生产。比如：“松江旧无暑袜店，暑月间穿毡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③在这里，百余家袜店控制“合郡男妇”的生产，这些分散的小生产者，实质上已成为包买主所控制下的雇佣工人。在苏州由于纺织业发达，小商品生产者也发生了两极分化，有的成为作坊主，多数成为雇佣劳动者，出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 366 页

② 胡琢：《~~清~~镇纪闻》卷二《记风俗》

范廉：《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现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苏州府志》记载：“明万历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所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代。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粥后散归。若机房工作减，则此辈衣食无所矣。每桥有行头分遣。”^①这里已经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出现了出卖劳动力的市场。

就是在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商品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城市及其城乡集市贸易相当活跃，一批各具经济特色的城市及其商业相当繁荣。“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赢”^②，成为闻名全国的商业都会。农村集市大量兴起，形成“居民稠密，往来商贾，络绎不绝”^③的商业繁荣景象。在盛产渔盐的海州，“民多逐末”^④。在商品云集的沿运码头济宁“趋末者众”^⑤。可见，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出现在江南、东南沿海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而且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淮河流域，商品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也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开始分化，产生了新兴的市民阶层，成为愈来愈壮大、愈来愈活跃的社会力量。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社会分工日渐细化的趋势下，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性质日益显现，商品经济侵袭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作用也较明显。但是，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时生产

乾隆：《苏州府志》卷三

② 《广志绎》卷一

正德《淮安府志》卷五

隆庆《海州志》卷二

⑤ 《济宁直隶州志》卷三

力虽有提高，但还冲不破旧生产关系的束缚；商品经济虽有相当发展，仍然摆脱不了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旧生产方式的羁绊。但是，不管怎样，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的出现。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二、封建剥削压迫加重，阶级矛盾日趋激化

明朝中叶从英宗以后，封建统治开始走向没落衰败的道路。统治阶级日趋腐败，对人民剥削压迫日益加重，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皇帝长期不理朝政，出现了宦官专政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统治阶级更加生活腐化，贪得无厌。他们贪婪搜括，中饱私囊，挥霍无度，骄奢淫逸，使封建统治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明武宗的婚礼，用掉黄金八千五百二十两、白银五十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两。而当时的政府收入，除米麦等实物外，所入银两仅一百五十余万两。^①武宗还嫌宫内挥霍淫乐不足，跑到外地抢掠妇女、财物，甚至南至徐州、扬州、两淮和南京等地，到处勒索财物，夺人妻女，“近淮三四百里间无得免者”^②。也曾派人到王良家乡安丰场勒索供其游猎的鹰犬。嘉靖时的权相严嵩，“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③。严嵩倒台时查抄家产，发现历年所掠财物竟有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而国家存银不足十万两。

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奢侈挥霍，必然要对人民群众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加重剥削。明中叶以后的官私租是有史以来最重的，私租一般为百分之五十，高产的三吴之地，“一亩之收，

① 《明武宗正德实录》

毛奇龄：《明武宗外纪》

③ 《明史》卷 210 《王宗茂传》《邹应龙传》

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①，剥削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有人说：“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②当时有些民谣反映农民的处境是：“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③重租之外，尚有繁重的徭役。按明朝政府规定，有田土的官吏可以免役。所以各种差役，“历年只编民户”，以致“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④正德以后，明朝政府又把各项力差，相继改为银差，银差之外，复征力差，千方百计加重农民负担。

明中叶以后，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狂潮，千万小农从土地上排挤出来。土地兼并的特点，是由皇帝和贵族带头，建立皇、官庄直接经营土地。一些王公大臣、外戚和宦官，以及各地的地主都在兼并土地。正德时权宦刘瑾在天津附近的庄田就不下千顷。和刘瑾同为八虎之一的谷大用，也侵占民田万余顷。^⑤万历时，在江南竟然有占田七万顷的特大地主。^⑥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从15世纪30年代开始，在全国许多地区都爆发了农民的大量逃亡，形成广大的流民群，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人民逃亡，田地抛荒，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所有这些反映了明中叶以后社会矛盾的深化，暴露了明朝统治危机的深刻程度。

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对人民群众剥削压迫的加重，搞得民不聊生，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人民起义连续不断。从明英宗正统到武宗正德年间（1436~1521）的六七十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特别是正德年间，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导致

② 《日知录集释》卷10

③ 《广治平略》卷3

④ 《明宪宗成化实录》卷33

⑤ 《明英宗实录》

⑥ 张居正：《答应天巡抚宋阴山论均田足民》

全国范围的人民起义。武宗正德四年，“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并盗起”，“六年自畿辅迄江、淮、楚、蜀，盗贼杀官吏；山东尤甚，至破九十余城道路梗绝”。^①当时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和四川、江西的农民起义，差不多同时并起，使明中叶的人民起义形成高潮。正德三年（1508），湖广生员崔逢头，施州卫军人张瑞等八十名首义者到达四川大宁盐场，千余灶丁蜂起响应，领导人中鄢本恕、廖惠都是灶丁。后来他们接纳了营山县商人蓝廷瑞参加，众至十余万，置四十八总管，奉廷瑞为“顺天王”，蔓延至陕西、湖广境内。特别是正德五年（1510）在北京附近爆发的以刘六（刘宠）、刘七（刘宸）为首的农民起义声势最为浩大。他们树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的大旗，从河北进军山东、河南，南下湖广，抵江西，后来他们进军湖北，攻克汉口，复沿江东下，进迫南京，经镇江，直抵通州狼山、常熟福山港，整个江面被其占领。王良的家乡一带通州、泰州、如皋等滨江之地和淮南盐场皆受影响。义军在通州登陆后，谋划由淮安入山东，结果为官军击败。历时三年的起义，战斗到正德七年（1512年）八月，终至在南通兵败，刘七等人战死在狼山。正德时，江西地区先从北部，后到南部，也爆发了多次起义，一直到正德十三年（1518年），才被王守仁镇压下去。

此外，还有所谓“南倭北虏”问题，即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和东方倭寇的入侵。反映了明中叶以来不仅阶级矛盾激化，而且民族矛盾也很突出。李贽在《焚书》中就曾说过：“余初仕时，亲见南倭北虏之乱矣。最后入滇，又熟闻上官、瑶、僮之变矣。”这些都说明明代中叶以后封建统治危机的深刻与严重。

^① 《明史·武宗本纪》

三、文化科学日趋繁荣，思想学术空前活跃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就不能不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中来。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恩格斯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①明代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阶段，生产力结构、阶级结构以至社会风气都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这就不能不在文化科学和思想学术上表现出来，出现日趋繁荣的局面。

在文化方面，明代文学的发展，前期成就不大，中叶以后，在文学艺术上有很大的发展，文坛上出现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这是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上的种种变化分不开的。因为在这以后，统治阶级日益腐朽，政治腐败，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加重，迫使人民不断反抗，各处起义连绵不断，明朝统治陷入严重危机。加之，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幼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力量的日益壮大。这些政治、经济上的变化，不能不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反映，推动文化的进步和发展。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日益活跃，市民文学也逐渐发展起来。其中的小说，经过唐宋以来的发展，到明代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章回小说经过宋元两代的长期孕育，到明代已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明初开始出现了一批章回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标志着我国在古典小说方面已经进入新的光辉灿烂的发展阶段。明中叶以后，在文学艺术领域则出现了曲折反映劳动人民愿望的《西游记》，在稍后则出现了反映豪绅地主生活腐朽、道德败坏的《金瓶梅》，在短篇小说和戏曲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在科学技术方面，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出现了

① 《马恩选集》第4卷第506页

一批自然科学家和优秀的科学技术著作。例如，李时珍在亲自实地采访考察的基础上，写成《本草纲目》，对 16 世纪以前的中国医学，进行了科学总结，把我国医药学的科学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医药学的经典，在世界药理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全面介绍我们祖先从事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它总结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纠正了某些不符合实际的诬记妄言；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抨击了不劳而食、骄奢淫逸的封建寄生阶级。

在思想学术方面，明代中期以前，朱熹理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在整个思想界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人们“非朱子之传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①人们的思想麻木僵化至极，整个思想界毫无生气，如同一潭死水。

恩格斯说，任何一种新的学说，“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事实之中”。^②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经济上，政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能不反映到人们思想中来，促使人们去思考、研究社会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一般地说，在社会和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往往难以出现新的思想和新的学派；而在社会矛盾激化，封建统治危机严重，各种社会问题充分暴露出来以后，总是会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和善于思索的思想家去思考、探索问题，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从而出现一些新的思想观点和新的学派。

明代中叶出现的社会危机，促使人们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对它维护封建秩序的社会功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纷纷探寻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想新学说。在这探寻的过程中，由陈献章开其端，王守仁总其成，形成了一股崇尚心学的社会思潮。

朱彝尊：《曝书亭集·道诗录序》

^② 《马恩选集》第 4 集第 506 页

王守仁心学是作为程朱理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通过批判程朱理学而逐步建立起心学体系。王守仁从“心为主宰”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致良知”说，认为“良知是个是非之心”，“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这种“致良知”的实质，是要人们加强封建道德修养，“存天理，去人欲”，用内心的良知来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但是，王守仁心学在主观上是为了巩固封建社会秩序，客观上却为思想解放开辟了道路，为解除陈腐传统观念和进行变革创造了有利条件。王守仁心学一经提出和迅速传播，很快就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在思想上逐渐代替朱学而居于主要地位。它打开了人们的思路，活跃了思想空气，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和繁荣。

自从王守仁心学崛起并广泛传播，明代中叶以后，思想学术逐渐出现了繁荣和活跃的局面，出现了各种进步的哲学和社会思潮以及各种学派，可以与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相媲美。

一是王学正宗各派。王守仁逝世后，他的弟子由于对王学的理解不同，出现了思想观点上的分歧，逐步形成了各个流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王门正宗各派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六个流派，并阐述了各派观点的异同。在王学正宗各派的思想中虽然也有一些积极因素，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保守，缺少时代特色。

二是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曾经师事王守仁，但他坚持独立思考，“时时不满其师说”^①；“往往驾师说之上”。^②王守仁死后，他回到家乡安丰场自立门户，开门授徒，创立了不同于王学的自成一家的独立学派。王艮及其后学颜山农、何心隐、李贽等由服膺王学到背离王学，大胆地批判封建正宗思想，宣传自己的“异端”思想，在下层人民中广泛传播。在他们的思

《泰州学案·序言》

② 《明史·王艮传》

想影响下，在晚明掀起了一股带有启蒙性质的人文主义思潮。黄宗羲在《泰州学案》中说，泰州学派“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他们是“赤手以搏龙蛇”，欲“掀翻天地”的“叛逆”者。

三是东林学派。是明万历年间由被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政治反对派集团。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改良朝政，反对宦官专权；在经济上反对王公、勋戚对土地的掠夺，反对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学术上主张讲学自由，提倡实学，所有这些都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们在哲学思想上很贫乏，他们批评王守仁的心性之学，但又“恪遵洛闽”“以朱为宗”未能摆脱程朱理学的影响。

四是以王廷相、吕坤为代表的反道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们又都是无神论者，并且都是宋明理学的反对者。他们的进步思想在思想界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他们不敢反对封建名教，有一定的局限性。

此外，在王学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还有湛若水与王学的辩难，有止修学派对王学的修正，有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

由此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在思想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学派，有正宗王学内部各派，有泰州学派、东林学派和王廷相、吕坤等唯物主义思想家，还有湛若水学派、止修学派，以及程朱学派。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一个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些学派中，除了程、朱学派和正宗王学各派外，他们尽管派别不同，思想观点也大有差异，但他们的基本思想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却具有相似的色采，不少学派和思想家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与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制度相对立的倾向，他们的思想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前人的水平。

上述的时代背景，也是时代的特点。说明中国古老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特

点是：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幼芽；政治上明王朝的昏庸腐败，阶级矛盾激化，人民起义不断，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文化科学上日趋繁荣，思想学术不断进步，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和新的社会思潮。这一切都说明明代中叶以后，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与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相媲美的时代。泰州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时也说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变革的需要，它是适应时代的变革而产生的，是时代的产物。时代需要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时代也造就了这样的启蒙思想家。

第二章 王学与泰州学派

王守仁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继朱熹之后在思想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是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因当时人们称他为阳明先生，故他创立的心学体系称阳明学或王学。

明朝中叶以后，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政治上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封建统治开始走下坡路，到武宗年间形成了明代政治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的腐败和争斗，北方边界的民族战争，是这一危机的主要标志。在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在这个腐朽的封建母体里孕育着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了资本主义幼芽和新兴的市民阶层。这样的政治经济状况，不能不反映到社会意识中来，向思想家们提出更新观念，大胆探索，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

一、王学的崛起

在明初，朱熹理学在思想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实际上已变成了一种宗教教条。但到了明朝中叶，社会出现严重危机，这就促使人们对朱熹理学进行反思，对它维护封建秩序的社会功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纷纷探寻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新思想新学说，决心告别朱学，转向陆王心学，形成了一股崇尚心学的社会思潮。

心学的真正倡导者是陆九渊。他不满意朱熹把理与心分为二的哲学思想，提出“心即理”的命题。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

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①又说：“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②并且明确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③的思想。陆九渊在批判程朱理学的过程中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从而创立了心学，与程朱理学相抗衡，但未能形成声势，却长期“泯然无闻”。直到明中叶，陈献章、王守仁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心学，改变“是朱非陆”的定论，把心学推上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中叶心学的崛起，是由陈献章开其端，王守仁总其成。陈献章首树心学旗帜，从朱学转变为陆学，明确提出“舍彼之繁而求吾心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为学只要“求之吾心即可”，而不必即物外索，此乃“心学法门”。陈献章心学的出现，既是明初朱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述：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目，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④

心学虽由陈献章开其端，但总其成，即形成心学完整体系，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王守仁。他总结了陆九渊的“心即理”、“明本心”的学说，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心学，建立了以“致良知”为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开创了心学的新局面，成为心学的一代宗师。它使宋明理学到明代中叶以后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一出现，便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和极强的感染力博得众多人的信仰，在社会思想上取代朱学而占据统治地位。正如有些

^③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十一、三十六

^④ 《明史·儒林传序》卷二百八十二

学者说：“姚江之学，嘉隆以来，几偏天下。”^①“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学者，始接踵于人间。”^②王学的迅速崛起和广泛传播，说明它的出现适应了明中叶社会和思想发展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它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起过积极的作用。王守仁自从龙场大悟“格物”之旨以后，即开始讲学授徒，宣传他的心学思想。他特辟稽山书院，四方从学如云，盛极一时，影响极大，遍及全国。从王守仁开始，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产生了一个重要转变，即主观唯心主义逐渐取代客观唯心主义。其后许多思想家以主观精神和程朱理学相抗衡，由崇拜经典，崇拜偶像，向崇拜良知，崇拜自我过渡，一改程朱理学统治下的思想僵化的局面，对泰州学派和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近、现代的启蒙运动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王学的积极作用和对泰州学派的思想影响

王学的积极作用和对泰州学派的思想影响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王学提倡“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者、天地万物之主”的世界观，虽然从根本上颠倒了物质与精神关系，但它强调主观精神，有助于破除封建名教的束缚，起了促进思想解放的作用，对泰州学派有重要的影响。

在程朱理学统治的年代，把“天理”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天理”不仅具有至上性，而且能主宰、支配自然、社会和人的行动。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也是天理的体现。人们的一切都受“天理”的支配和统治，个人在这里完全是被动的、消极的，人被取消了独立存在的价值。王守仁心学突破了“天理”一

^① 《汤斌》：《答陆稼书》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

统的局面，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观点，把“天理”拉下主宰者的宝座，降到“吾心良知”之中，并把“吾心良知”确立为最高本体的地位，把“吾心良知”上升为“天理”，起着主宰天地万物的作用，这是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肯定。这种强调主观精神作用的思想，虽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夸大了人心的作用，但它对于冲破“天理”——封建伦理道德的羁绊，发展个性的思想解放、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王守仁的这种“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者，天地万物之主”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以及它所体现的主体精神，对泰州学派有重要的影响。但泰州学派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进一步加以改造和发展，从“心为天地万物的主宰”发展为“身为天地万物之本”；从精神性的“心”主宰天地万物发展为物质性的“身”主宰天地万物；从玄妙虚幻的“我的灵明”中拉回到现实的人身之中，并把“身”置于“心”之上，从“心”主宰“身”发展为“身”主宰“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种“身为天地万物之本”的观点与“心为天地万物主宰”的观点有很大的区别。它们虽然都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但王守仁强调的是人心的主体性，王艮则是强调人身的主体性，前者强调的是精神性的主体性，后者强调的是物质性的主体性，即人的主体性。这种从精神性的主体性发展为物质性的主体性，真正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作用，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人的主体精神的觉醒，对于冲破思想禁锢，促进思想解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王学轻视儒家经典的作用，以“吾心”、“良知”作为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准，在客观上破除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促进个性解放有着积极的作用，对泰州学派也有重要影响。

自汉代以来，特别是在程朱理学统治的年代，思想界都是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以朱熹注释为准绳。不仅孔孟之言、圣贤经典是不准怀疑的绝对真理，就是朱熹的注释，也一字一句不能更动，只能照读照背。人们立身行事，说话作文章，以及判